

杨海明著

唐宋词史

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

唐宋词史

杨海明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462,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80519-069-0/I·20

统一书号: 10354·052 定价: (精)7.40元
(平)5.50元

责任编辑 吴小平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唐宋词——我国古典诗苑中的秀花奇葩·····	1
第一节 对于唐宋词的“整体观”·····	3
(一) “狭深文体”和“心绪文学”·····	3
(二) “忧患意识”和伤感色彩·····	5
(三) “南方文学”和“柔美”风格·····	10
第二节 唐宋词的发展轨迹·····	20
(一) 唐宋词史的阶段性的·····	20
(二) 从“少”到“老”的演进过程·····	21
(三) 从“春”到“冬”的发展轨迹·····	24
第二章 词的原始和朴素的形态——唐宋民间词·····	31
第一节 词的起源：诗与音乐“第三次合作”的“新产品”·····	31
第二节 词的原始和朴素形态——唐五代民间词·····	45
第三节 两宋词坛的一股“潜流”——宋代民间词·····	59
第三章 展苞初放的唐五代文人词·····	71
第一节 中唐文人词：文人词的尝试、小异阶段·····	71
第二节 “词为艳科”局面的形成——《花间》词·····	81
(一) “爱情意识”在文学领域里掀起的“第三次浪潮” ——从《香奁》诗到《花间》词的过渡·····	81
(二) “花间鼻祖”温庭筠奠定了“类型风格”的基石·····	101
(三) 《花间》其他作家、作品述评·····	108
第三节 南唐词——“忧患意识”的“潜入”和“勃发”·····	119

(一) “堂虎特大”的冯延巳词·····	120
(二) “感慨遂深”的李煜词·····	131
第四章 北宋词坛“鸟瞰”：词的多元化发展·····	146
第一节 北宋社会的两大侧面和北宋文化的两大层次·····	147
(一) “升平时代”的两大侧面和词坛的“富贵气象”·····	148
(二) 北宋文化的两大层次和词坛的两种“趣味”·····	159
第二节 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和复杂心理·····	168
(一) 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	169
(二) 北宋文人的复杂心理·····	175
第三节 北宋词的多元化发展：词与时代的同步前进·····	182
第五章 五代词风的“延伸”与“提高”——北宋小令词·····	188
第一节 富贵闲雅的晏殊词·····	190
第二节 雅俗并存的欧阳修词·····	196
第三节 “追逼《花间》”的晏几道词·····	209
第四节 北宋后期小令词坛“点将录”·····	222
(一) 张舜民·····	222
(二) 魏夫人·····	224
(三) 李之仪·····	226
(四) 仲殊·····	229
(五) 陈克·····	232
第六章 柳永慢词开启了“宋词”的新天地·····	236

第一节 慢词发展的历史回顾和北宋慢词的蓬勃兴盛	236
(一) 慢词发展的历史回顾	236
(二) 北宋“新声”的竞繁和慢词长调的勃兴	239
第二节 “以俗为美”的柳永慢词	244
(一) “官场失利”和“情场得意”的柳永	244
(二) 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引向了市井坊曲	247
(三) “承平气象”和“羁旅行役”	252
(四) 为“才子佳人”、“情郎情女”们热情歌唱	259
(五) 传统词风的“放大”与“俗化”	267
第七章 “新天下耳目”的苏轼词——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282
第一节 苏轼以前词坛上的“社会化”倾向	282
第二节 苏轼完成了词的比较充分的“士大夫化”	285
(一) 一位忧国爱民、深有抱负的士大夫文人	291
(二) 一位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士大夫文人	294
(三) 一位饱经忧患、深思深虑的士大夫文人	296
第三节 “新天下耳目”的苏轼词风	307
(一) “开放型”的“自然而然”的新词风	307
(二) 对“婉约”词风进行的“雅化”	314
第四节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老坡”	317
第八章 北宋后期的词坛	321
第一节 黄庭坚、晁补之	321

第二节 秦观	327
第三节 贺铸	336
第四节 周邦彦	344
第九章 南宋词坛“鸟瞰”:宋词的“极盛”和“渐衰”	365
第一节 “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	365
第二节 南宋战和交替的政局和词坛上的两股忧国 之音	370
第三节 南宋文人的“雅致”和“雅词”	378
第四节 异军特起的“豪气词”	387
第十章 南宋前期(1127—1161)的“伤感词”、“愤慨词”、 “隐逸词”	393
第一节 南宋前期词坛的“低音区”——“伤感词”(李 清照词)	395
第二节 南宋前期词坛的“高音区”——“愤慨词”	409
(一) 李纲、赵鼎、胡铨	413
(二) 张元干	418
(三) 张孝祥	421
第三节 南宋前期词坛的“尘外音”——“隐逸词”	429
(一) 朱敦儒及其他词人	431
(二) 叶梦得、李光及其他	436
第十一章 被时代所召唤回来的“男子汉风格”:辛派	

爱国词.....	441
第一节 词坛的“巨龙”——辛弃疾	442
(一) 辛氏身世的“不凡”和“不偶”：“英雄豪杰” 与“隐士狂者”.....	442
(二) 辛词内容的“充实”和“提高”：“狂放精神” 与“以气入词”.....	446
(三) 辛词形式的“解放”和“换班”：“以文为词” 与“熔铸百家”.....	457
(四) 辛词风格的繁富和多样：“亦刚亦柔”与“亦 庄亦谐”	468
第二节 “辛派爱国词”概述	476
(一) 陆游词中的“从军乐”与“爱国泪”.....	476
(二) 直陈“经济之怀”的陈亮词.....	479
(三) “词多壮语，盖学稼轩”的刘过词.....	482
(四) 充满“焦灼感”和“批判色彩”的刘克庄词.....	484
(五) “奇特”、“愤怒”的陈人杰词	490
第十二章 “雅词”营垒里的“伤痕文学”：姜夔和吴文英词.....	493
第一节 “幽韵冷香”白石词	497
(一) 白石词中所反映的“伤痕”心理.....	497
(二) “柳品”和“梅品”统一起来的白石词品.....	507
第二节 “芬菲铿丽”梦窗词	517

(一) 梦窗词中的“绵绵长恨”和“变态心理”	517
(二) “万花为春”、“七宝楼台”的梦窗词风	526
第十三章 “风雨如晦”、“春去人间”的宋末词坛	534
第一节 “缘事而发”的亡国哀音	535
第二节 “同中有异”的“浙派词人”和“江西词人”	541
第十四章 余论：对于唐宋词史的“反思”	552
第一节 “词境”——中国古典诗歌高度成熟的标志	553
(一) “词境”——爱情意识和忧患意识的理想	
“归宿”	556
(二) “词境”——中国韵文里头最为优美的一	
种意境	558
第二节 “词境”——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厚积淀和	
“再投资”	562
(一) “以悲为美”	563
(二) “以艳为美”	568
(三) “以柔为美”	571
(四) “以文采为美”和“以含蓄为美”	573
后记	578
主要参考书目	582

第一章

序论：唐宋词——我国 古典诗苑中的秀花奇葩

我们伟大的祖国，素有“诗国”之称。在这悠久而广袤的诗的国度里，耸立着千树万木，盛开着群花簇卉，依着时、空的扩展，分别构成了一丛丛诗的“群落”和一条条诗的“植被带”，各各呈现着自己的千姿百态，吐露出自己的特种芳香。明人胡应麟曾经这样叙说过从《诗经》时代到唐朝的诗苑盛况：“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诗薮》内编卷一）不过，他的话还仅说了一半：在“三唐”以后，诗的“气运”并没有宣告终结；相反，它还有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唐诗继续引出了宋诗、元诗、明诗、清诗……；另一方面，在它的苑地里，又诞生了新的“品种”——词、曲。这后面两种新花，由于“天时”、“地理”和“人工栽培”等方面的原因，在宋、元两代，却也开放得极为妍丽绰约、惹人喜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掩过了作为“正统”文体的“诗”的“颜色”。所以到了清代，焦循就已把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和唐代的“诗”并提为“一代之胜”（《易余龠录》卷十五），而直至今日，“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也还一直被广大古典诗歌的读者们挂在口上。这说明，宋代（当然还应当包括在它之前的唐五

代)的“词”，确称得上是我国古典诗苑中的又一丛秀花奇葩——说它是“秀花”，是指它的秀美艳丽；说它是“奇葩”，则既是指它的常被持保守观点的人排斥在“正统文学”的营垒外，又是指它的不全同于“诗”的个性差异。正如辛词(《鹧鸪天》)“花不知名分外娇”中所写的“野芳”那样，“词”虽没有被供奉在“大雅之堂”的花瓶里，然而却以它的异香奇色深深地吸引了无数的作者和读者，使这诗苑的特殊一角(指词苑)成了令人无限留恋的观赏游览胜地。

不仅如此。唐宋词除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着自己的“思想意义”或“思想价值”——不能设想，光有一张美丽的“画皮”而缺乏思想“灵魂”的作品是能够如此久久地吸引和深深地打动着读者之心的。“豪放”的爱国词篇(如辛弃疾的很多词篇)，表现着民族的浩然“正气”，这自不待多说；而即使是那类“婉约”的“言情”之作，其中也同样倾注着唐宋两代作者的满腔挚情，映现着他们的神貌心态，因而也同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心灵文献”。人类历史是在艰难曲折的过程中走过来的。我们在唐宋词人的词篇中，至少从一个侧面或一个“窗口”，看到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之长夜里，人们追求爱情自由、追求美好理想、追求崇高人格、追求祖国前途的思想火花是如何萌生、如何勃发、如何在压迫和窒抑之下不屈不挠地燃烧，如何在寒夜的寂寞和黑暗之中闪发着光焰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所说的这句话，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词”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逊于“诗”，也尽管以往时代的一些文人，往往视它为“小技”，但是，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它却无可抹杀地具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因此，就应该给“词”、特别是给唐宋词写“史”。

可惜的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尚未见有以新的观点作指导的词史著作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人们已经提出：在今后的词学研究中，有许多项工作要做，“而写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

点为指导的词史,无疑是词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词学》)。此话反映了学术界的盼企,也反映了广大读者的殷望。为了尽快填补这一空白,更是为了“抛砖引玉”(因为我深知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因而只能是如此),所以不揣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的低下,“冒险”来作这样的一种尝试。错误和疏漏,自然极难避免;要之,能因之而引出一部比较成熟和水平较高的词史著作,那就是本书作者的一大心愿了。

第一节 对于唐宋词的“整体观”

(一) “狭深文体”和“心绪文学”

在诗的世界里,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在诗坛的穹幕上,有着万万千千的行星和恒星。它们分别有着自己的“种族风格”,各自释放出长短不同的波和色彩不同的光。因此,在撰写词史之始,有必要对“词”这样一种颇有些“特异性”的诗体,作一番整体上的宏观考察。从全部唐宋词的历史事实出发,我们发现,“词”虽然从广义上看也属“诗”的一个支派、一个“家族”,它们之间存在着血缘之亲;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的个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就表现在:虽然同为抒情的“载体”,但是“诗”所载负和容纳的“感情分量”和“生活内容”,比较来说就显得厚重、宽广,而“词”则显得轻微、狭细——当然,仅仅这样说是不够全面的,还应当补充的是:“词”在抒情的“方向性”方面,却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就是:它正朝着其“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掘和伸进。尽管后来的词中,也出现过“以诗为词”(甚至是“以文为词”)、诗词合流式的作品,但从它的全局、或至少是那些占着很大比重的“正宗”、“本色”型作品来看,该是如此的。

对于这一特点，王国维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是指“诗境”之“阔”和“词境”之“狭”；“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则又是指“词境”相对而言（与“诗境”比较）的显得“长”和“深”。词之为体，不似壮士，却象一位窈窕颀长的女性那样，特擅作轻歌曼舞而不善作厮杀呐喊（所以清人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魏塘曹学士之言曰：“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表现在抒情的“类型”方面，它就特长于抒写那类深微细腻、“幽约怨悱”（张惠言《词选序》）的感情，而不太象“诗”那样，能较为宽广地抒写情志和反映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比起“诗”来，似乎是一种抒情程度更“纯粹”、更“狭深”、更细腻的文体。它所抒写的感情，不妨称之为“情绪”、“心绪”、“心态”或“心曲”更来得适宜。比如下面这首词：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温庭筠《梦江南》）

在破折号前的四句，所写的是一般的“恨”，这种感情是“诗”中常可见到的。而在破折号后的一句（“摇曳碧云斜”），则就描摹了一种极为动荡迷离、惆怅难言的“心绪”或“心态”。朱彝尊所说的“词虽小技……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陈纬云红盐词序》），大致就指的是此类感情境界。又如：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颰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
欲皱还休。
（范成大《眼儿媚》下片）

此中所写的“春慵”，恰似那一塘溶溶泄泄的春水那样，微波荡漾，不能自休，其幽细程度亦为一般“诗”中所少见。

——“词”所最乐于抒写、也是最擅长描摹的，就是这一种近似于漪涟状态的“心绪”和“心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真不愧是一种“心绪”的文学。虽然在“诗”中，也不乏对于心绪的类似描写，但从其刻划的细腻程度而言，则词就堪称是对诗的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者又是一种“量变”基础上所达到的“部分质变”。

从词的“狭深”的抒情性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整部唐宋词史的这样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题材相当的狭窄。我们在唐宋两代人所写的两万多首词中，简直看不到一点儿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影子，举此一点就足以见出唐宋词题材的惊人狭隘性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原因，但是，无论如何，词体本身的局限性却无疑又是这些原因当中的“一个”。明白了这点，我们对唐宋词在整体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性”比较薄弱（与唐诗相比，也是与宋诗相比而言）这一缺点，也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宽容、而不至过分苛严的“谅解”了。

但是，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面：由于“词”的努力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所以它就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深蕴在人类心灵“底层”的某些感情内容，就能在更为细腻和窈深的意境中显示人类长期凝贮起来的心理积淀，因而其感人的艺术魅力也就越加丰厚。陈廷焯所说的“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白雨斋词话自序》），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鉴于上面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将分外珍视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宽；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十分注意发掘词在抒情艺术方面的进步。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比较全面地认清词史发展的线索和把握住它的发展过程。

（二）“忧患意识”和伤感色彩

在整个唐宋词坛上，有一个“幽灵”不时在徘徊踟蹰。这个“幽

灵”，便是那一股深浓的“忧患意识”。

晚清的大词论家况周颐，对此就有甚为深切的体味。他说：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卷一）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同上）

他所说的“无端哀怨触”和风雨江山之外的“万不得已”的思想感情，拿我们的话来说，便是那一种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宇宙的“忧患意识”。而正是由它构成了“词心”和“词境”的“内核”。

这样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我们不妨从题材内容出发，对三大类型的唐宋词篇作一个大略的分析。

爱情和青春，照理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生活内容之一。然而，唐宋词在写到这两个主题时，除了极少量的作品中闪现过明亮欢快的色调之外，绝大多数作品却是充满了哀怨和抑郁的色调的。在封建时代，自由的、美满的爱情是极难寻觅和长留的，因此词人们在讴歌它的同时，又不得不唱出痛苦的哀歌。“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绾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薛昭蕴《小重山》），这是相思的苦恼；“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张泌《浣溪沙》），这是悼亡的深痛；“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姜夔《鹧鸪天》），这是对于爱情的忏悔；“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钗头凤》），这又是对于封建礼教的怨愤。象大石块底下蜿蜒曲折地长出的可怜小草一样，唐宋文人的正常人性（爱情）却受到了如此顽固而无情的压抑，词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怎能不

流露出浓重的“忧患”情绪呢？因此，即使在写到“青春”这一美好的主题时，由于它常与爱情缠绕在一起，所以同样也会发出“欲挽不能”的悲音：“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秦观《江城子》）最美妙的年华伴随着爱情的破灭而一起长逝了，词人的内心和他们所塑造的“词境”中，自然便充溢着“万不得已”的“哀怨怅触”了。

如果说，上述作品中的忧患意识还是由一身一己的不幸遭遇所感发的话，那么在下面这类忧国忧政的词篇中，忧患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就更深广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危机，再加上作者自己的身世遭遇，凡此种种，都通过着“忧患”的面貌，充分地凸现出来。“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张元干《贺新郎》），词人悲天悯人，忧患的“矛头”甚至直指“天意”（兼指皇帝和上帝）；“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辛弃疾《水龙吟》），词人登临远眺，其忧患的对象又从现实进而“扩张”到了“千古”的历史，真可谓是充斥宇宙，巨大而又深悠。

——即使就在那类貌似“悠然出世”的山水隐逸词中，忧患意识也仍然象摆脱不了的“阴魂”一样，老萦绕或潜藏在其中。“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张孝祥的《西江月》描写了这样一片“脱俗如鸥”的“悠然”心境，看似达到了“遗世独立”的精神境地，但“世路已惯”四字不又暗示出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并不真正平坦而照样深藏着忧患之感吗？东坡说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就告诉我们，词人们的忧患意识几乎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包的，即使在他们“羽化而登仙”之时，也会油然袭上心头。

所以，总的来看，唐宋词篇中简直到处存在或“潜伏”着忧患的意识、忧患的情绪。这种现象既是前代诗歌“诗可以怨”（《论语·

阳货》)的传统之继承和发展,又传递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信息。从前者言,中国古典诗歌本有着表现忧患意识的悠久传统,所谓“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是也。《变风》《变雅》之作,体现着作者对于政治的忧患之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传》);《古诗十九首》,大多唱着一曲曲忧患人生的哀歌;而中晚唐的诗中,也随处可以读到“浮世本来多聚散”(李商隐《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今日乱离俱是梦”(韦庄《忆昔》)式的忧伤诗篇。不过,到了唐宋词篇中,这种现象却有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萧统《文选序》)的发展,这又不能不说是与时代的某种契机有着关系的。五代十国,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衰世,弥漫在社会上的那股危机感、忧患感,不可能不涌进当时诞生未久的词篇中;北宋时代,虽然进入了一个统一的年代,但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进入了它的“中老年”(这种进程可以从安史之乱算起),由社会危机所引起的士大夫文人内心的忧患意识也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日趋“成熟化”(苏轼便是一个典型),而刚在晚唐五代“复苏”不久的爱情意识此时又受到了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新的压抑,所以表现在北宋词中的忧患情绪又有了新的抬头;进入南宋,由于民族矛盾的空前加剧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更使忧患意识象被煽动的火苗一般“燃烧”、“跳跃”得更加炽盛……“诗”的传统,再加上“时代”的某些因素在起作用,终于促使“词”与“忧患意识”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姻缘”。所以,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传》),词人们则是“为愁”而“赋词”者居大半也(辛弃疾《丑奴儿》词云:“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即从反面告诉我们:“词”似乎专门是为“愁”而作的)。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古风·填词》曾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在他的“填词字典”中,就赫然以“忧患”两字横在当头!

由于唐宋词篇和忧患意识关系如此的密切,所以就使整部词

史出现了这样两个总体上的特色：

第一是它的“悲剧性”。唐宋词章中所写的题材，不外是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国仇家恨、世路艰难，英雄老去、报国无门，以及韶华难驻、盛时不再，总之，都是一些令人感慨唏嘘、掩卷怆然的忧伤事情；唐宋词章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些痴男怨女、思妇愁客，或是一些失意的漂泊者、“失路”的豪杰儿，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苦闷，他们悲凉，总之，他们的心头几乎凝聚了人类全部的悲剧性体验而艰难孤独地行进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上……

第二是它的“伤感性”。我们发现，在唐宋词章中最为触人眼帘的字眼便是：泪、梦、愁、恨、怨、叹……我们又注意到，不论是“婉约”词的缠绵凄怆、绮怨哀婉，还是“豪放”词的悲慨苍凉、“抚时感事”，最终却都逃脱不了“伤感”的调门。人说李后主的词是用“血”写成的（《人间词话》），说秦观的词是“伤心人”所作（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又说辛弃疾词是“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这些话无不表明，尽管它们的内容和风格并不相同，但把它们所发出的不同声响，通过“音谱分析”之后，却都能“分滤”出相同的“伤感音素”！

对于词中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性、伤感性的美感类型、风格色彩，我们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以往对于“婉约”词的颇有些粗暴的贬低，往往就与此有关。确实，忧患、悲伤的情绪肯定地有着它不免于消极、低沉的一面，但是在它的“反面”却又蕴藏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肯定。人类的历史，是在充满着痛苦烦恼的艰难进程中走过来的；它每行进一步，都要向着人类索取肉体和精神上的一定代价。因而，“悲剧”在任何时候（特别在黑暗的封建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忧患和伤感也就是人类必定要向历史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一。曹雪芹自题《红楼梦》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